

中国古代

智謀四书

老子



陈立明等
评注

鬼谷子

长短经

三略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中国古代智谋四书

陈立明 梁兴科 段方乐 常晋芳 评注
山东友谊出版社



传统文化四书系列
中国古代智谋四书

陈立明 梁兴科 评注
段方乐 常晋芳

*

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
(地址: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)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625 印张 2 插页 420 千字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5000

ISBN 7—80551—994—3
G·107 定价: 22.00 元



老子 是老子思想的集中体现。

老子哲学从自然和社会现象中归纳出事物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的规律。后世孙武、范蠡以及汉、唐国策均受到老子辩证法的影响。此作虽仅五千余言，却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历史内涵。

鬼谷子 传为纵横家的始祖鬼谷子所著。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术，确立了游说的基本理论体系。有学者称其“大可以用之于天下，小可以用之于个人”。

三略 传为黄石公撰。杂采儒学的仁、义、礼，法家的权、术、势，墨家的尚贤，道家的贵柔，以至谶纬之说，是一部重要的政治、军事权谋著作。

长短经 系统地总结了历史上的权谋思想，显露出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政治学家的真知灼见。作者唐人赵蕤一生隐居，但当时许多文臣武将出自他的门下。

前言：中国古代的谋略文化

中国的谋略文化源远流长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类型，古代谋略具有自己特殊的道德观念、价值判断标准和逻辑思维方式，并且与其他观念形态的文化相因相存，共同发展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过重要的影响。

一、古代谋略文化的起源

谋略，是一种运用权谋和策略趋利避害，引导事态发展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社会行为。追根溯源，古代谋略产生于传说中三皇五帝敷土治国的实践，是对当时政治斗争和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。

在相传为上古之书的《尚书》中，记载了上古和三代时期的政府文告及最高统治者的告谕之辞。其中的《大禹谟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洪范》诸篇，阐述了中国最早的政治谋略思想。《大禹谟》是舜帝对大禹的告诫之辞，其中提出“敬德保民”、“允执厥中”的重要思想。舜帝要求大禹建立道德，克制私欲，顺从天下百姓的意志愿望。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，不自满，假惟汝贤。汝惟不矜，天下莫与汝争能；汝惟不伐，天下莫与汝争功。予懋乃德，嘉乃丕绩，天之历数在汝躬。汝终陟元后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无稽之言勿听，弗询之谋勿庸（用）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春秋时期孔子提出“为政以德”、“执

两用中”的思想渊源，它也直接启发了老子“持盈守盅”的哲学思想。

《洪范》相传是殷商旧臣箕子向周武王面陈的治国之道。洪，大；范，规范，标准。“洪范”即宏大的规范之意。今山东长清县境内犹有洪范池。箕子以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行作为治国的根本大法。“一五行。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爰稼穡。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从革作辛，稼穡作甘。”五行思想是从鲧禹治水平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历史经验。鲧采用堙的方法治水，结果失败；鲧的儿子禹总结了鲧治水失败的教训，改用疏导的方法治水，终于取得了成功。《尚书》的作者将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种物质性元素作为世界的本原，认识到五种物质性元素具有不同的性质，人们应根据它们性质的不同因势利导，加以利用。这标志着人们哲学认识的巨大进步。战国时期，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用五行学说解释历史发展，提出“五德终始”说。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受五德的支配，五种德运和势力相生相克，周而复始，于是产生王朝的兴替变换。

所以，古代谋略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《尚书》。同古代哲学一样，它产生于征服自然，改造社会的实践，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丰富和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，具有了丰富多样的形态。

二、古代谋略文化的基本类型

春秋时期，诸子百家蜂起，各种学术思潮互相激荡、冲击，形成了不同流派和类型的谋略文化。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等各派的代表人物，围绕着如何建立理想的政治、如何实现天下统一等重大问题，展开激烈的论辩。这个时期学术的中心是社会政治问题，这种社会历史背景铸造和形成了中国古代谋略文化的品

格，即重视实用理性和人文精神，关注道德和价值问题，而不刻意追求形而上的玄思和构造知识体系。谋略文化的基本类型，包括道家之谋、兵家之谋、纵横家之谋、法家之谋等，都是在这—时期或稍后奠定了它们的理论形态而走向成熟。

1. 道家权谋

老子在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建立了一个道体观的理论体系。“道”是脱离了个别事物的抽象的实在，它没有具体的物质形态，超越时间、空间而存在，而又有精质、有形象，老子叫它“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”。从道产生出宇宙和天地，阴阳和合产生万物，这就是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的宇宙生成论。由于道具有的这些特点，人不可能通过感官去认识，而只能收视反听，返照内心，靠领悟和体证去体认和把握。这就是老子“静观”、“玄览”的认识路线。

然而，老子的道体观最终是指向无为而治的政治观。他将治理天下的法则称为“稽式”。道的原则是“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”，即虽然生育万物而不占有，有所作为而不企图回报，身居长位而不主宰命令。按照道的精神去治理天下，就应该效法自然，清静无为，努力做到无欲、无事而好静，使百姓自我化育，即老子说的“我无为，而民自化；我好静，而民自正；我无事，而民自富；我无欲，而民自朴。”（《五十七章》）老子将“无为”上升到政治的最高原则，主张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”（《五十七章》），“无为而无不为。取天下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”（《四十八章》）清静无为，是老子和道家谋略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
老子在主张统治者自身采取无为而治的同时，还主张对于人民也要实行一种“愚民”的策略，即不是教给人民巧智，而是使他们无知无欲，淳朴自然，返归到含哺而熙、鼓腹而游的状态。他说：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”（《六十五章》）

“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知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”（《三章》）强其筋骨，弱其志欲，使那些有知识的人不敢出来作对，这样就可以较为顺利地实现统治。

由于老子的“道”具有高度的抽象思辨性，特别是老子的辩证法和政治观所具有的社会功利性，老子哲学成为后世各派谋略学说共同思想和理论根源。

2. 兵家权谋

我国古代的兵家权谋对谋略文化的发生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兵家权谋本身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。它们集中体现在《孙子兵法》、《三略》等军事谋略著作中。

《孙子兵法》首先将战争这种人类社会现象作为整体考察，提出了系统的战争观和军事辩证法思想。孙子认为进行战争之前首先要计算利害，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（《九地篇》），认真考察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等“五事”。在此基础上，对敌我双方的“七计”即七种情况进行分析和比较。“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而索其情”，即可大体确定战争的胜负。

孙子认为，军事双方的对抗和较量，首先是双方首领的智慧、经验的较量。凡兵戎相见，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：“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下政攻城。攻城之法为不得已。”“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，而非战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；毁人之国，而非久也；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”军事谋略的应用贵在因利制权、为势于外，即善于隐藏自己的实力，使对方受制于己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。“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；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”（《计篇》）在《势篇》里，他又用“奇正相

生”来概括和阐述了他的军事权谋思想。孙子说：“三军之众，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，奇正是也。”所谓正，指正面当敌之兵，引申为战争活动中的正规原则；奇，本指斜出旁击之兵，引申为战争活动中灵活机动的原则。奇与正是对敌我双方军事活动的众寡、强弱、虚实、治乱、攻守等的概括和升华。“奇正相生”、“奇正之变”即指原则性与灵活性、一般与个别的统一。孙子认为，战势变化表现于正奇两极连续性转化的无穷过程之中。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，不竭如江河。终而复始，日月是也；死而复生，四时是也。声不过五，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听也；色不过五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也；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，不可胜尝也；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！”（《势篇》）善于运用奇正之术，就能做到奇中有正，正中有奇，奇正相生，正奇合一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
《三略》又称《太公兵法》。该书系统地论述了统军驭兵、治理国家的军事、政治谋略，而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范畴。《三略》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，认为治国用兵的根本原则，在于兼刚柔强弱四者而用之，善于与物推移，因敌转化，如此则天下可得，国家可治，战无不克。《三略》从统治者的角度，提出选贤举能的重要性。人民为国之根本，人才为国之中坚。得人才者得天下，失人才者失天下。苟能人尽其才，野无遗贤，民安其位，则干强本固，政令畅通。延揽人才的方法在崇礼重禄，礼贤下士。《三略》认为，求贤之道，因人而异，或致之以德，或致之以道。“清白之士，不可以爵禄得；节义之士，不可以威刑胁。故明君求贤，必观其所以而致焉。致清白之士，修其礼；致节义之士，修其道。然后士可致而名可得。”（《下略》）将帅恕人如己，推恩施惠，就可以使三军一心，士卒用命，稳操全胜。这些方面又体现了《三略》所受儒家仁义思想的影响。

3. 纵横家权谋

春秋以来，王室失纲，礼崩乐坏，诸侯争霸，纵横之术因势大兴。纵横家即当时以纵横之术游说诸侯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臣策士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谓：“纵横者，所以明辩说、善辞令，以通上下之志者也。”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有苏秦、张仪等，他们都曾经师事鬼谷子。现存《鬼谷子》一书或系后人伪托，但其中保存了纵横家的思想资料。

《鬼谷子》是对古代游说和外交规律的系统总结，是我国第一部游说术理论专著。《鬼谷子》提出“捭阖”的概念。捭即开启，阖即闭藏，捭阖的矛盾运动产生了阴阳对立、四时变化，化育了世间万物，捭阖体现了天地自然的根本法则。遵循阴阳捭阖的道理，“可以说人，可以说家，可以说国，可以说天下”（《捭阖第一》）。

在捭阖学说的基础上，《鬼谷子》建立了一个“知”、“情”、“意”结合的谋略体系。“知”就是对游说对方和客观形势的权量、估计和评价。《鬼谷子》认为，进献说辞、运用谋略，首先必须了解对象的性情、才能、权谋，慎重衡量利害得失，这是谋略运用的基础。“何谓量权？曰：度于大小，谋于众寡，称货财之有无，料人民多少、饶乏、有余不足几何，辨地形之险易孰利、孰害，谋虑孰长、孰短，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，与宾客之智睿孰少孰多，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，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，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、孰危，孰好、孰憎，反侧孰便，能知此者，是谓量权。”（《揣篇第七》）只有在度权量能的基础上，才能施行飞箝之术以结连对方，运用忤合之术以坚定自己的意志。“故忤合之道，己必自度材能、知睿，量长短、远近、孰不如？乃可以进，乃可以退，乃可以纵，乃可以横。”（《忤合第六》）

《鬼谷子》排斥忠信仁义的道德准则，而将功利实用性置于

价值判断的首位，主张一谋不能全两忠。“世无常贵，事无常师。圣人无为无不为，无所听，无所不听。成于事而合于计谋，与之为主。合于彼而离于此，计谋不两忠。必有反忤，反于是，忤于彼；忤于此，反于彼。”（《忤合第六》）如果料定某人的事业一定会成功，彼此的计谋又相契合，就与众人一起拥立他做天下的君主。《鬼谷子》甚至公开主张：“世可以治，则抵而塞之，不可治，则抵而得之。”（《抵巇第四》）即如果社会矛盾能够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下解决时，就尽力堵塞漏洞，消除矛盾，维持原来的统治秩序；如果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，不能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下解决时，就要摧毁旧的统治秩序，自己取而代之。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发人所未敢发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，对于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力量。所以《鬼谷子》和传统谋略文化遭到统治者和儒士的贬斥、诋毁，是很自然的。

“情”是对“知”的进一步深化和运用。它包含情感和真情两方面的意义。对于游说者来说，只有双方情意相投，才能达到游说的目的。在谈到得情的作用时，《鬼谷子》认为：“不见其类而为之者，见逆；不得其情而说之者，见非。得其情，乃制其术。”（《内捷第三》）探知对方实情的基本方法，一是钓语，即人动己静，根据对方言谈中描摹的形象和类比的事理推知对方的真情实意，犹如猎人张网以待。二是反听，改变语言的形象和事理，借以开启对方的情意，通过责难、诘问从而判定对方言谈的情伪真假。三是揣情，通过对方甚喜、甚惧等真情实感的流露，从而探知对方的真实思想。通过以上方法，达到得情的目的。

“意”是《鬼谷子》谋略系统中的意志性要素，它是指游说者在进行游说活动时，认真揣度天下的形势，按照自然之理设计谋略，判断事情之可行与否，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，阐明政策的利弊得失，从而控驭君主意志的活动。通过这种活动，使对方

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谋略，为谋略运用奠定共同的心理基础。《鬼谷子》提出“内捷”的方法，即内进说辞以捷所谋：“事皆有内捷，素结本始。或结以道德，或结以党友，或结以财货，或结以采色。用其意，欲入则入，欲出则出，欲亲则亲，欲疏则疏，欲就则就，欲去则去，欲求则求，欲思则思。若蛛母之从其子也，出无间，入无朕，独往独来，莫之能止。”（《内捷第三》）主张根据对方嗜欲、爱好的不同，或用道德结连君王，或用友道结连君王，或用财货结连君王，或用声色娱乐结连君王，使对方对自己言听计从，收功于无形之中。在《摩篇》中，更进一步指出了摩意的具体方法。这就是根据同类相应的道理，投合对方的性情、欲望和爱好，用类似或相近的言行去打动对方，使之暴露出真实意图。“其摩者，有以平，有以正，有以喜，有以怒，有以名，有以行，有以廉，有以信，有以利，有以卑。平者，静也；正者，直也；喜者，悦也；怒者，动也；名者，发也；行者，成也；廉者，洁也；信者，明也；利者，求也；卑者，谄也。故圣人所以独用者，众人皆用之，然无成功者，其用之非也。故谋莫难于周密，说莫难于悉听，事莫难于必成。此三者，唯圣人然后能任之。故谋必欲周密，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，故曰：或结而无隙也。夫事成必合于数。故曰：道数与时相偶者也。说者听必合于情，故曰：情合者听。”（《摩篇第八》）

纵横术，一名勾距之术、长短之术，其流传和应用历久不衰，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在研究它。汉代荀悦《申鉴》，张劭《人物志》，唐代赵蕤《长短经》，宋代《素书》，明代冯梦龙著《智囊补》，以及近代曾国藩的《冰鉴》等智谋学著作，都属于纵横术的范围。《长短经》是同类著作中值得重视的一部。它运用大量的历史事例，系统总结和分析了历代治政经验，并对人物得失进行评判，显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对于历史的真知灼见。

4. 法家权谋

法家在谋略上的主要特色是主张以法治国。战国时期，韩非系统地总结了法家理论，创立了以“法”为本，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，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

“法”指的是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、法令、政策等；“术”指选任官员、控驭臣下的手段、策略。“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“势”指的是君主的地位和权力。在韩非子之前，商鞅、申不害、慎到诸人曾经从不同角度，提出过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等思想，但在韩非子看来“皆未尽善也”。他认为商鞅“徒法而无术”，申不害“徒术而无法”，慎到则偏于“自然之势”，都是片面的，不完善的，主张将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三者结合起来。他指出：“抱法处势则治，背法去势则乱。”（《韩非子·难势》）“君无术则弊于上，臣无法则乱于下，此不可一日无，皆帝王之具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“抱法”、“行术”必须以“处势”为前提，而“抱法”、“行术”也是“处势”的重要手段；“行术”又是“抱法”的必要方法。在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三者中，“法”是最根本的，但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，相辅以为用。

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，反对任用心术。法治的基本要求是，制定明确的法律，并公布于众；法律要统一、稳定，并要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加以修订；奖励耕战，严格执行赏罚制度；“赏厚而信，刑重而必”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；废除世袭的贵族分封制、世袭制，实行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的官吏选拔制度；并要求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，主张“以法为教”、“以吏为师”，“使境内之民，其言谈者必轨于法”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。

三、古代谋略文化的基本精神

古代谋略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，培养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品格和精神。概括地说，在价值观上，具有重利轻义、实用理性的特点；在逻辑思维方式上，表现为“正奇相生”的二极辩证思维方式；在认知结构上，表现为知、情、意结合的认知方式。

1. 重利轻义、实用理性的价值观

古代谋略文化的一大特色，就在于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。孙武认为用兵是国家的大事，千里馈粮，国力耗竭，因此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不能尽知用兵之利，主张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。《鬼谷子》将度权量能作为任使用权谋的基础，提出要慎重地考察君主的才能、权谋及其客观情势，权衡利害得失。如果对方足以担当大命，就会同天下人拥立他做君主；如果君主昏暗，天下不可以治理，就可以取而代之。战国纵横家如苏秦、张仪等人或主张合纵、或主张连横，支配他们行为的唯一原则，就是利益驱动。如果我们抛开狭隘的个人功利观念，将谋略、智慧用之于国家、天下，则这种实用理性便也无可厚非。当今国际间政治、外交的角逐，又何尝不是受利益的驱使？所谓“在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”，便是对这种功利原则的恰当概括。

2. 奇正相生、智圆行方的辩证思维方式

奇与正是对政治、军事和外交领域中各种矛盾现象的概括和提炼，它们代表了相互对立、相互依存的两极。奇正之变、奇正相生是辩证法在谋略中的具体应用和体现，是古代谋略文化的精髓和最引人入胜之处。老聃最早确立了贵柔、守雌的辩证法传统，他从大量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中，认识到强壮的事物不可避免

地走向衰老和死亡，而弱小的事物则充满生机，因此提出“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”和“柔弱胜刚强”。孙武在军事领域将这种矛盾对立转化的思想发挥到极致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”“战势不过奇正。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”《鬼谷子》提出阴阳、捭阖的概念，认为圣人谋之于阴而成之于阳，阴道而阳取之。所以主事经常成功，老百姓不知其利，按圣人的谋略行事而不自知；主持军事每每取得胜利，人民不知道能够畏慑征服敌人的原因，在不起师旅、不费国用的情况下战胜敌人。他将这称为“神明”。强弱、曲直、有余不足乃至亲疏、远近都是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的。“故为强者积于弱也，为直者积于曲也，有余者积于不足也，此其道术行也。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，内亲而外疏者说外。故因其疑以变之，因其见以然之，因其说以要之，因其势以成之，因其恶以权之，因其患以斥之。摩而恐之，离而动之，微而正之，符而应之，拥而塞之，乱而惑之，是谓计谋。计谋之用，公不如私，私不如结，结比而无隙者也。正不如奇，奇流而不止者也。”奇正的变化不绝如江河，流而不止。善于把握奇正变化，就可以做到“善守者，藏于九地之下；善攻者，动于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胜也”（《孙子兵法·形篇》）。

3. 知情意结合的认知方式

在认知结构上，谋略文化是一个知、情、意互相结合的有机统一的整体。知即对于谋略对象及其客观条件的认知和把握，情是指谋略的主体与客体情感上的交流和融洽一致，意是指双方精神、理念上的互相契合，知、情、意分别代表了谋略文化系统中的理智、情感和意志要素。在谋略实施的过程中，必须首先对谋略的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，以确定谋略之是否可用。所以，“知”是“情”、“意”活动的基础，只有在“知”的基础上才能展开“情”、“意”活动。“情”是促进谋略主客体之间交流的重

要因素，要善于把握对方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，用对方感兴趣的事物去打动对方，同时善于察言观色，见微知著，从当前的细微的现象中推测出事物将来发展的趋势。在“知”、“情”的基础上，还要达到双方理念的一致。如果信念、志趣各异，再好的计策也不会得到实施，所以“事有不合者，圣人不为谋也”。

目 录

前言：中国古代的谋略文化·····	(1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老 子

导读·····	(3)	十六章·····	(20)
上篇·····	(7)	十七章·····	(21)
一章·····	(7)	十八章·····	(22)
二章·····	(8)	十九章·····	(23)
三章·····	(9)	二十章·····	(24)
四章·····	(10)	二十一章·····	(25)
五章·····	(10)	二十二章·····	(26)
六章·····	(11)	二十三章·····	(28)
七章·····	(12)	二十四章·····	(29)
八章·····	(13)	二十五章·····	(29)
九章·····	(13)	二十六章·····	(30)
十章·····	(14)	二十七章·····	(31)
十一章·····	(15)	二十八章·····	(32)
十二章·····	(16)	二十九章·····	(34)
十三章·····	(17)	三十章·····	(35)
十四章·····	(18)	三十一章·····	(36)
十五章·····	(19)	三十二章·····	(37)